

五四新文學與底層文化的隔膜

● 摩 羅

這幾年不斷有人指出，中國文學已經死了。所謂文學死了，並不是說中國的文學寫作者停止了文學產品的生產，而是指社會公眾對這些文學產品不再關心，或者說，在社會公眾看來，當下的文學作品跟自己的生活沒有甚麼關係，不值得傾注時間精力予以關心。

就文學生產而言，現在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文學作品最為豐富的時代。僅僅長篇小說每年就出版一千餘部，而那沒有出版或者自費出版的小說可能是這個數字的幾十倍。至於散文、隨筆、詩歌等文體，只要進入任何一家網站就不難感覺到其生產勢頭之盛。誇張一點說，所有經常上網的人都在進行各種形式的文學寫作，這些人或者已經作品豐厚，無愧於作家的稱號，或者暫時作品不多，但是增長勢頭很好，實際上是一個潛在的作家。

有如此多的作品和作家，為甚麼無法鋪墊出文學的錦繡前程？反倒以此宣告了文學的死亡？問題出在哪裏？癥結隱藏在甚麼地方？

我在這裏只想探討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文學跟底層民眾的精神文化生活有何關係。換一個角度說，以往的理論家是如何建構文學與底層人精神文化的關係的？以往的作家在創作實踐中是如何面對底層人的精神文化的？由此形成了一個甚麼樣的文學精神和文學傳統？這種制約跟今天我們所意識到的文學的死亡有甚麼關係？就文學的本來意義而言，我們的文學本來應該如何面對底層人的精神文化？如果我們的文學傳統沒有做到這個「應該」，那麼我們日後應該怎樣盡力實踐這個「應該」？

我們的文學源頭無疑隱藏在五四新文學運動之中。五四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化運動，本來就是在主張平民的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的國際背景下發生的，所以在理論上帶着強烈的平民化傾向。陳獨秀和周作人都明確指出所謂新文學就是平民的文學。誰是平民？當然是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農民，也就是孟子所說的「勞力者」。李大釗滿懷激情地說這是一個勞工神聖的時代，我們所建設的新文化當然必

須體現這種神聖性。瞿秋白進一步指出，所謂新文學就是應該為這些廣大勞工服務的文學。毛澤東更是將平民和勞工具體化了，落實為工農兵這三種身份，並主張要寫工農兵的生活，要為工農兵的文化需求寫作。「工農兵」既是一種政治身份，也是一種經濟身份（社會資源分配的底層），同時無疑也是一種文化身份。千百年來，政治和經濟資源掌握在政治精英手中，文化資源掌握在擁有話語權的文化精英手中。無論從政治、經濟還是文化資源的角度來說，我們都不得不做出這樣的結論：所謂工農兵就是底層人。

看來，自從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那些具有影響力的言論領袖都在主張、在強調文學必須跟底層人建立密切關係，甚至可以不太誇張地說，他們的文學精神就是立志為底層人服務，他們從事文學建設的戰略眼光一直是盯着底層人的。可是在這樣的戰略眼光背後，究竟隱含着甚麼樣的價值信念、文化胸懷、政治功利、歷史目標、審美趣味、社會認同和宗教觀念？

毫無疑問，提倡、創造、建設新文學的人物，全都是精英人物。他們雖然主觀上企圖描摹底層人群的生活風貌和精神狀態，但他們只能按照自己的精英意識形態和精英趣味來觀照、剪裁、塑造底層人的形象。他們感興趣的僅僅在於底層人對精英群體的理解、認可和追隨，而對於底層人的文化信念、審美趣味、生活習俗，他們一直進行着無情的嘲弄、殘酷的批判和嚴厲的審判。無知、自私、狹隘、愚昧、奴性、麻木、低級趣味等詞語，是他們為底層人寫下的診斷報告，底層人必須無條件接受精英群體的文化啟蒙和靈魂改造。

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精英群體按照自己的視角和趣味塑造了華老栓、閻土、阿Q、祥林嫂、三仙姑（趙樹理《小二黑結婚》）、陳奐生（高曉聲《陳奐生上城》）等底層人的形象，塑造這些人物形象的作品被作為深刻表現底層人群社會和文化特徵的典範，並在精英群體中廣泛流傳。精英群體帶着啟蒙的激情、批判的衝動、拯救的善意、教育的理想、改造的願望，對這些形象所代表的群體進行反覆的描述和展示，作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現代小說通過這種大規模的、頻繁的、複製式的描述和展示，營造了自身的繁榮和浩瀚，精英群體的作者和讀者在這種鍥而不捨的創作和展示中充分體驗了自身的崇高和勤奮。

但實際上，這些號稱為平民寫作的精英人物，沒有任何一篇小說是寫給底層人閱讀的。底層人既不可能、也不需要去閱讀這些小說。因為底層人從來沒有生活在精英群體所構建的論題和語境之中。

底層群體一直保留了遠古時代遺留下來的精神文化，古人敬天禮神的宇宙觀和生活態度從來沒有在底層社會消失過。底層社會從來不是單純由人組成的，每一間簡陋的草房裏都同時生活着灶神、門神、牀神、村神、攤神、天神、土地神、祖先神、冤鬼、厲鬼、貓魂、狗魂、老鼠精、狐狸精以及房主一家。這個複雜的鬼神世界不但存在於底層人的家中，還存在於底層社會的所有公共空間，比如祠堂、廟宇、集市、店鋪、村巷、道路、驛站、亭閣樓台、山川田野等等，無不被這個複雜的鬼神世界所覆蓋。

底層人的心靈空間也完整地體現了這個鬼神世界的複雜性和豐富性。在處理人間的事務時，底層人必須借

助鬼神的方式，否則他們將不知所措。在處理鬼神的事務時，底層人必須借助人事的方式，否則他們也將不知所措。當他們遇到社會難題或者人生困境時，求神問卜是他們的必修課。當他們侍奉鬼神時，他們祭獻酒食、燔奉錢財、張口求告、虔誠許願，猶如侍奉掌握着他們命運的世俗官長。如果說精英群體生活在人類社會的平面世界中，底層群體則是生活在一個由天堂、人間、地獄構成的立體世界之中。如果說精英群體的大腦裝滿了人類社會的爾虞我詐、權力財色，底層人的大腦則在柴米油鹽之外，還裝滿了天神地祇、妖魔鬼怪，以及這些鬼神與芸芸眾生相輔相成、相助相殘、相愛相恨、相交相錯的古今傳奇。

底層人的精神空間是一個上天下地、大起大落、大開大合的世界，它的豐富性、原始性、草根性常常是精英群體的文化想像力所不能抵達的。那些借助一個文人、兩個政客、三個地痞、四個商人、五個小姐、六個嫖客來演繹人間恩怨是非的精英小說，與底層人的精神世界相比，難免顯得單薄、淺陋、蒼白，二者幾乎可以說格格不入。

與底層人的精神世界相對應，底層人的審美趣味也帶上了若干仙韻神味、妖氛鬼氣，而且有自己獨特的符號體系和主題模式。或者帝王將相、才子佳人，或者仙女下凡、狐狸成精。講英雄傳奇必須有勇有謀、有功有德，講愛情故事必須死後團圓，講牛郎織女必須藕斷絲連，講大奸大惡必須見到報應，講大善大美必須見到美滿結局，講平凡人物則深諳人獸相通的哲理，對人性陰暗面的理解總是那麼通透而又寬容。

一百年來，精英群體創造了卷帙浩繁的現代小說，業已建立自己的主題模式、審美趣味和文體特徵。他們一直自覺地用自己的主題模式和底層群體所欣賞的主題模式相對抗，並企圖以此改造民間文藝的主題模式和審美趣味。但是，精英小說的文體特徵、敘事方式以及主題模式，一直無法得到底層群體的了解和認可。充斥於現代小說中的進步與反動、執著與懷疑、個人與集體、個性與時代、民主與專制、理想與現實、團結與分裂、絕望與希望等主題與底層群體的距離，遠遠大於仙狐鬼怪與底層人的距離。用精英群體的審美趣味改造底層群體的審美趣味的企圖，年復一年地遭到失敗。

人類作為地球上生命之一種，與荒野的喬木、地上的鮮花、天上的飛禽、山谷的走獸、海裏的游魚、草間的鳴蟲共有着同樣的生命，這就是人類真實的生命狀態。人類作為一種有文化的物種，與上帝、諸神、魔鬼、神仙、精靈、巫覡等等共同生活在自己所創造的文化空間和精神空間，這就是人類真實的文化狀態和精神狀態。

底層社會的精神文化生態，比今天精英群體所理解的文化概念要廣闊許多、豐富許多。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所建構的文化觀念，實際上只是精英群體為了爭奪社會政治領域的領導權而建構的意識形態話語體系。當他們以精英的姿態建構這些話語體系時，根本不屑於了解底層社會的完整的文化生態環境，而只是以一種高高在上的心態對其中不利於自己建構領導權的因素予以否定和批判，並由這種部分的否定與批判發展為整體的否定和批判。所以，一百年來精英群體

與底層社會的文化體系一直保持着緊張的關係。底層文化體系因為沒有話語權利，只能處於被歪曲、被肢解、被否定、被批判、被限制、被取締的不利地位。一百年來，中國社會底層傳統文化被破壞、被取締、被消滅的內容不可勝數。這是中國文化所蒙受的巨大損失，也是中國底層群體所遭受的巨大傷害。

在這個精英群體批判和破壞底層社會精神文化的過程中，現代文學特別是其中的主流文體現代小說，忠實地執行了其創造主體（精英群體）的思想主張，準確地體現了其創造主體（精英群體）的文化態度和情感傾向。我們從所謂新文學浩如煙海的作品中所讀到的底層社會，被抹上了一層又一層批判的油漆，這些油漆的名字是愚昧、自私、落後、迷信等等。一百年來，這個精英群體太關注自己群體的領導權問題，他們的企圖僅僅在於把底層群體改造得能夠幫助精英群體奪取和掌握歷史進程中的領導權，而沒有耐心去了解底層人自己的真實生態和需求。所以，真實的底層社會及其精神文化，精英群體從來沒有認真研究過，精英群體所創造的現代文學，也基本上沒有認真研究過。

時至今日，當現代文學尤其是現代小說遭到政治和文化精英群體的歷史性遺棄的時候，本來就不曾對之稍加青睞的底層群體也絕不會趁機將它撿進自己的菜籃或糞筐。作為精英文化之一部分的現代小說所懷有的啟蒙愚眾、改造民間的文化理想，從來沒有得到過愚眾和民間的認可與配合。在往後的歲月中，如果現代文學對所謂愚眾和民間沒有更深入的研究、更通透的認識、更豐富本真的表現、更體貼的理解、更真誠的尊重，如果現

代文學對所謂愚眾和民間不能躬下自我崇高的腰肢、擴展自己的文化胸懷、打通天上人間的精神通道、變化自己的文化面孔，那麼，最後不得不退出歷史舞台的不會是底層群體以及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民間文化，而只能是現代文學本身。這樣的文學死了也就死了吧，這樣的文學不死才怪。

也許現代文學應該慶幸一百年來底層群體從來沒有關注過、理解過自己。假如底層人真的有機會讀懂這個精英群體所建構的文學體系及其符號，恐怕只會加深他們跟精英群體的分歧和隔膜。他們不可能像精英人物所期待的那樣，對阿Q們予以蔑視和批判，因為他們實在找不出阿Q有甚麼不能見人的過錯。他們很可能會說：你們通過社會變革，謀到了高官厚祿、豪華的小轎車、成群的服務員和女秘書，阿Q只不過想得到一位妻子（而不是一群）、一間草房（而不是別墅）、一張睡覺的寧式牀（而不是金鑾殿），他的要求難道太高嗎？你們口口聲聲說要為底層人謀解放，為甚麼對阿Q這麼一個遮風避雨的理想也如此極盡嘲弄和批判？你們所謂解放阿Q，難道就是為了你們要佔有一切，而讓阿Q永遠一無所有嗎？如果阿Q的兄弟這樣發問，我們有甚麼的回答稱得上真誠而又問心無愧？

我們的文學如果不甘死滅，如果還想繼續佔有歷史舞台，繼續維持自身的繁榮和價值，那麼，它不但需要找到新的文化資源，還需要找到新的社會良知的起點。

摩羅 中國藝術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